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

近代上海职员 生活史

江文君著



JINDAISHANGHAIZHIYUAN
SHENGHUOSHI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

近代上海职员 生活史

江文君著



JINDAISHANGHAIZHIYUAN
SHENGHUOSHI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上海职员生活史/江文君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7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

ISBN 978 - 7 - 5326 - 3450 - 7

I. ①近... II. ①江... III. ①中等资产阶级—社会生
活—研究—上海市—1900~1949 IV. ①D69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1922 号

责任编辑 王继红

封面设计 明 婕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
近代上海职员生活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26.25 插页 2 字数 324 000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3450 - 7/K · 800

定价: 5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2431119

教育部第五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4 年重大项目（批准号：04JJDZH007）研究成果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研究成果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资助项目
2008 年度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项目资助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编纂委员会

主任

熊月之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军 马学强 宋钻友 张 剑
张晓敏 陈祖恩 金大陆 周 武
承 载 钱 杭 唐克敏 彭卫国
熊月之 潘 涛

总 序

熊月之

在古今中外城市史上,没有一个城市像近代上海那么内蕴丰富,情况复杂。这里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庭),三个警察系统,三个公交系统,三个供水系统,三个供电系统,电压有两种(法租界是 115 伏,公共租界是 220 伏),有轨电车的路轨宽度也分两种。

假如有人想从南京路乘电车去中国城里的某个地方,他必须先乘英国电车到租界边的爱德华七世大街(今延安东路),接着穿过马路进入法租界,乘法国电车到南头,然后穿过民国路,再乘中国电车继续前行。在这趟半个多小时的路途上,首先看到的是穿着英国警察制服的英国人、白俄人和印度锡克族人,然后是穿着法国警察制服的法国人、白俄人和越南人,最后是中国警察。^[1]

这里人口多元。域内人口八成以上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湖南、山东等 18 个省区。同乡会是他们最熟悉的组织,同乡是他们最亲切的关系,名目繁多的会馆、公所,为同乡寻

找工作、排解纠纷、申诉冤屈、子女就学、看病就医、办理婚丧嫁娶之事,发挥重要作用。千姿百态的地方话、地方菜、地方戏,成为各路同乡认同的重要标志。外侨人口最多时超过 15 万,所属国籍与民族最多时超过 60 个,各种总会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交场所,日本人则自成社区,将虹口地区建成了“小东京”。

这里货币多元。几乎所有重要的列强都有银行在上海发行过货币,确切可计的有 18 家。它们发行的各种面值、各种文字、各种颜色、各种图案的纸币,英国女王头像、孙中山头像、自由女神像、赵公元帅像等,同时出现在上海货币市场上,光怪陆离,莫此为甚。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城市,哪怕是伦敦、纽约那样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城市,能够像这里有那么多品种的货币流通。

这里教育多元。除了国人官办或民办的学校之外,有教会办的,租界工部局、公董局办的,外侨团体办的,有在美国注册、用英语教学、英语考试的,如圣约翰大学,也有用法语、俄语、德语、日语教学的,学制、教员、教科书、教学方法、毕业文凭五花八门。

这里宗教多元。门类之多,教务之盛,信徒之众,均为全国其他城市所罕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之外,还有犹太教、东正教、袄教、锡克教、理教。这些信仰系统来源各异、形成历史长短不一、信奉对象千差万别、教堂样式千姿百态、礼拜仪式形形色色、节日庆典斑驳陆离的宗教,如果散布在世界各地,每个地方都自成一一道风景线,一旦汇集到一个城市,那就是众神毕至、群仙咸集、各显神通、各呈异彩的名副其实的宗教博览会。不难想象,近百年间的上海,这里是佛教的水陆法会、春节烧香、除夕撞钟、元宵彩灯、观音诞辰、龙华庙会、浴佛盛典、盂兰盆会;那里是道教的画符念咒、掐诀步罡、祈晴祷雨、驱鬼逐妖、占卜堪舆、超度亡灵,各路神仙从元始天尊、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九天玄女、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到铁拐李、吕洞宾、关公、钟馗、春申君、黄道婆、施相公、秦裕伯、陈化成，一路走来。一会儿是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五大功修、开斋节、宰牲节；一会儿是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的圣诞节、复活节、受难节、感恩节、圣餐礼拜、结婚礼拜、追思礼拜、安葬礼拜；一会儿又是犹太教的逾越节、五旬节、住棚节、普林节、修殿节、除酵节。这边是留蓄长发、上衣至膝、戴锡佩剑的“红头阿三”锡克教徒；那边是头戴白帽、身穿白衫的“白衣秀士”袄教信徒；再那边则是壁挂葫芦椰瓢、戒烟戒酒、大摆素斋的理教信众。

人口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必然带来节假日多元、风俗多元。一些多民族人混处的机关、团体、学校，为了照顾各自的宗教信仰，放假的节日就特别多。比如，圣约翰大学就中西节日兼顾，在春节、端午、中秋节要放假，在受难节、复活节、升天节、感恩节、圣诞节也要放假。

至于语言多元、报刊多元、饮食多元、服饰多元、建筑样式多元、娱乐方式多元，早已为人们所习知，毋庸赘言。

这么多的“多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近代上海处于中外两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处于多种文化影响的复合区域。

这里处于中国权力控制的边缘地带。租界虽是中国土地，但受治外法权保护，中国地方政府不仅不能管辖作为上海城市主体的租界里的外国人，连对租界里的华人也没有充分的管辖权，不能随意征税，不能随意拘捕，不能随意审判。

这里也处于英、美、法等国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公共租界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权力主要控制在英国人手里，但是，它不等于香港或新加坡，工部局总董不等于香港总督。工部局总董由租界有关居民选举产生，并不需要向英国政府或英国驻沪领事负责，也不一定总要听从英国领事的意见。法租界的情况有别于公共租界，但法租界与法

国政府的关系并不是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仅出现在一个租界与华界之间,那还比较简单,而出现在两个租界并存、三个政权同在的情况下,就更为特殊,对于英、法、中等权力控制系统来说,也更为边缘。俗话说:“天高皇帝远”,上海租界距离英、法、中国权力控制中心都特别遥远。

这种权力控制边缘地带,如果出现在政治体制相近、司法理念相近、价值观念相同的情况下,那还比较简单,其间的差异会较多地体现利益的不同、立场的不同。但事实是,英华、法华之间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既大异其趣,英法之间又曾为宿敌,在政治体制、司法理念、价值观念、文化传统方面也有很大差异。这样,在华界与公共租界、华界与法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之间,事实上存在三道行政控制的缝隙,整个上海便成为全世界古往今来独一无二而异质文化交织的特有区域。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复杂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以至于后来的研究者对其作任何简单的概括、断语都是一种冒险,都可能失之偏颇。你可以说它是黑色的染缸,我可以说它是红色的摇篮;你可以说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我可以说它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你可以说它摩登,我可以说它传统;你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罪恶之渊藪,我也可以列出一百条理由说它是文明之窗口。红与黑、善与恶、美与丑、进步与反动、世界性与地方性……几乎任何两极对立的判断,对上海来说都能成立。只有一种判断不会招致反驳,这就是:极其复杂。

近代上海城市的这种复杂性,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这首先表现在它的文化交流功能。近代上海很像一个袖珍地球,全世界不同民族文化,英、美、德、法、俄、日、犹太、印度……全中

国不同地域文化,南起香山、潮州,北到齐鲁、幽燕,东起江浙,西迄川湘,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俗,都到这里来一展风采,互相交流、融合。说它像一个袖珍地球,而不是世界文化博览会,因为很多外侨是这里的居民,而不是过客。居民与过客不同,居民有长久性,有认同感,长期居住在上海的英美人自称 Shanghailanders,直译就是上海人,过客则呈临时性,无认同感。因为是居民,所以,他们引进电灯、电话、自来水、抽水马桶,首先是自己欣赏,满足自用,而不是为了炫耀、兜售。其结果也有宣传作用,但这种宣传不是灌输式宣传,而是示范式宣传。灌输式宣传是我说你听,俯视式的,示范式宣传则是我做你看,平视式的,后者更能让受众心悦诚服,自觉接受。

这也表现在它的唯一性。放眼世界,盱衡古今,从古希腊到新大陆,从亚细亚到欧罗巴,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成千上万,有哪个城市会如此复杂?绝对没有。纽约、洛杉矶、巴黎等,也都是多民族移民城市,也都是多元文化,异质文化交织,但是,它们都不是行政机构多元、司法系统多元、交通系统多元、货币多元,在异质性程度方面,都远远不能与近代上海相比。

这还表现在它的不可复制性。道理很简单,那么多的多元的存在,是以中国政府丧失对租界的行政管辖权、司法权、教育权等为前提的,是以不平等条约为后盾的,任何一个独立国家都不会以丧失对一部分主权来进行这种复制。

这种不可复制性还在于,它的形成过程也不可复制。租界作为“国中之国”,并不是某个人、某个国家主观设计出来的,具有不可逆料性。治外法权是租界产生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西方列强在中国共设有 26 个租界,在许多城市享有治外法权,但没有哪个租界、哪个城市出现像上海这样复杂的情况。如果没有小刀会起义、没有道台权力失控、没有华洋混处,上海租界的形态就不会是后来人

们所熟知的那个样子,而小刀会起义、道台权力失控、华洋混处局面出现,都是彼时彼地、国际与国内、中央与地方、内政与外交、政府与人民、现实与历史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

内蕴如此丰富、情况如此复杂的城市,正是研究社会生活史的极好对象。

研究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从多时段、多角度、多侧面切入比较理想。为此,本书在卷目设计方面,既有以空间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公共活动场所(茶馆、饭店、旅社、浴室、广场、菜场)、公共娱乐场所(公园、影剧院、书场、游乐场、跑马厅、跑狗场、赌场)和校园生活的研究;也有以职业、阶层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买办、医生、报人、律师、科学技术工作者、舞女生活的研究;还有以国别、民族为维度展开的,如关于英美人、法国人、日本人、俄国人、犹太人、印度人的研究。各卷关注点以广义的社会生活为主,包括人们的居住、饮食、衣饰、交通、娱乐、交往、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工作环境、工作特点、收入、消费等方面,兼及其政治态度、精神生活。

本书以研究近代上海为主,兼及古代、当代上海。上海城市生活,从时间上看,明显地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43年开埠以前,那时的上海是中国普通沿海城市,与宁波等一般沿海城市相比,没有太多特别之处。第二阶段,为1843年至1949年5月,即通常称为近代的时期。第三阶段,1949年5月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第四阶段,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

古代上海是近代上海变迁的基础,当代上海是近代上海的延伸。1949年以后的上海城市生活,其变迁起伏,与整个中国城市生活变迁起伏的曲线基本一致,影响城市生活变迁的函数,时代因素重于区域因素,但是,上海仍然有其自身特点,有其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精神。

这是本丛书将古代、近代、当代连通起来进行研究的原因。

历史研究需要关注宏大叙事,也需要关注日常生活。如果能够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在关注宏大叙事时兼及日常生活,在关注日常生活背后有宏大叙事意义,更为理想。本丛书汇集这么多学者集中研究上海城市生活,除了上面所述的学术因素,即上海城市生活的极端复杂性强烈地刺激了我们的研究兴趣,我们还有一个奢望,就是通过这项研究的展开,试图探究一下彼此悬殊的异质文化,在相对平静的状态下,是如何相遇、共处、交流、融合的。这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个全人类已经面临、无数学者正在关注的重大问题。

这是因为,历史行进到信息时代,波音飞机、高速列车,极大地提升了人类个体流动的速度,手机、因特网,极大地加快了人类信息传播的速度,古人所臆想的千里眼、顺风耳、飞毛腿都已成为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员交流、信息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便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之间的理解、尊重、共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重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全世界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与其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冲突的担忧,还不如说是源于人们对文明对话、文明和谐的冀盼。历史是现实的老师,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总爱向历史请教,从历史中汲取养分。于是,异质文化解读史、异质文化交流史受到学界的空前重视。在这方面,近代上海是难得的个案。

以近代上海与今之世界相比,同构、相似之处极多。近代上海实为一小世界,今之世界实为一大上海。

本书总的框架、卷目由我设计,各卷内容则由作者独立完成,我既不参与其章节设计,也不负统稿之责。

本书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各卷作者多为上海

社会科学院专业研究人员,来自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宗教研究所、欧亚研究所,也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东华大学与上海档案馆的学者。多年来,课题组多次举行国际、国内各种类型的研讨会,对所研究对象以及中间成果进行交流、讨论,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本书是课题组成员多年来集体攻关的智慧结晶。值此项目完成之际,作为项目负责人,我谨向各位课题组成员,以及他们所在的单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2007年12月24日

注 释

- [1] 石海山等著,朱荣发译:《挪威人在上海 150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年,第70页。

洞悉中产阶级的指南（代序）

苏智良

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一词,最早出现在 1812 年出版的《牛津英语词典》。关于中产阶级的定义,存在诸多争议。学者通常认为,中产阶级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他们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他们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的文化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社会的中间水平。一般而言,中产阶级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学界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诞生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并且在 20 世纪的上半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其中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大都市形成中产阶级萌生、发展的温床。一般人的想像,典型的“上海中产”,与洋人并肩穿梭在上海街头,生活方式与租界里的洋人几乎无异,其实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未必均如此。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生活在租界里的上海中产阶级,率先嗅到了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气

息。一些中国手工业制造业主,在目睹洋人带来的新式生产方式后,都跃跃欲试筹办各类民族企业。这些企业家们筚路蓝缕,不断创新,仿照国外企业的建制和管理方式而发家。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促成了中国最早的“改革开放”:对租界的模仿学习不仅促成了商业上的成功,还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形象,并改变了上海的城市面貌。

在中国,尽管中产阶级已不是个陌生的话题。但在对近代中产阶级的研究,尚少有成果。主要是因为研究对象的界定较困难,所涉及的资料相当零散,工作量颇大,且理论上也有相当之难度。江文君博士知难而进,选择近代上海中产阶级这样一个颇有难度的论题,潜心数年,终于修成正果。

笔者认为,本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运用和借鉴了历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对中产阶级研究的学术史与现状有较系统的把握,作者关于中产阶级的定义及其学术溯源,写得非常厚实。根据社会学分层理论,作者提出,上海新兴中产阶级群体包括职员与自由职业者(专业人士)两个职业集团。他们主要是指以技能、学历、文凭为取向,由律师、会计师、记者、大学教授等组成的专业人士及作为中产阶级主体的工薪职员。

在分析中,作者尝试运用国际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成果,对中国近代工业化过程中的矛盾及其对中产阶级发展的特点的影响,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理论探讨,提出“新旧共栖的两元分层体制”观点。再如作者分析了中产阶级产生的二元社会结构,并以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业社会处调查作为主要资料,对上海中产阶级作了一次综

合的定量分析。首次从计量层面展现了上海中产阶级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

又如,本书探讨中产阶级在其中层组织内的政治话语,指出上海中产阶级参与政治的热情并不低下。然而即使有了中产阶级的次级群体,这一中层组织却始终无法从国家的控制中分离出来,成为西方意义上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实体。中产阶级不掌握话语霸权,更无法引导话语潮流,最终只能成为国家控制与党争的工具。

第二,作者第一次对城市中产阶级这一新的社会集团,给予全面、综合性的考察与研究。本书的研究策略首次对近代上海中产阶级作了全面的、综合性的考察与研究,比较清晰地再现了上海中产阶级的历史情境与轨迹,尤其是历史演变、生活习性、教育特点、专业人士的职场状态、家庭生活、娱乐休闲空间、民间组织形态及政治参与态度和渠道等进行了全景式的、多方面、多层面的系统考察,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某些空白。尽管在律师、会计、医生等行业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作者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自己的新见与新意。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为今日之社会研究提供历史的借鉴。

作者认为,长期以来,由于国内学术界对社会分层所持有的“两极化”模式,认为处于中间地位的中产阶级群体将会日渐消亡。所以在以往的社会史研究中,往往只关注到了社会阶层的两端,即上层剥削民众的官僚、地主和资产阶级,以及下层作为被剥削对象的农民和工人,因而缺乏一种中层视野与人文关怀。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地位的民众,长期作为“边缘性人物”而虚置在宏观叙事的背景中。虽然这个社会阶级在近代上海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阶层,其萌生及发展时期大致是在20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以

及随之而来的社会革命,中断了自晚清开启的工业化进程,并使由早期工业化本身所发展出来的城市中产阶级灰飞烟灭。

在对中产阶级进行考察的同时,作者依照社会史研究的常规做法,用诸如计量的方法统计群体的工资收入,把中产阶级的生活状况折算成可度量的标准进行比较等做法。工部局工业社会处有关上海职员生活的调查统计,为本文的定量分析章节提供了必要的原始数据。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专门社会调查与统计研究,也就是所谓伴有定量分析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是近代中国社会研究的起步阶段,众多的社会调查与研究相继展开。遗憾的是,民国时期的社会调查大多聚焦农村,即便是相关城市研究也多关注城市的下层阶级如劳工、人力车夫等,而几乎没有涉及都市中的中上阶层。城市中产阶级作为社会史上的失踪者长期被学界所忽视。在这里,作者通过工部局工业社会处的调查统计,首次从计量层面上展现了上海中产阶级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

第三,通过对中产阶级教育背景的考察,揭示出新式教育是形塑中产阶级的重要因素。作者提出,家庭出身所获得的先天禀赋又是获得新式教育的前提所在。上海城市中产阶级的家庭出身,多半来自中上之家的格局已然确立,从而形成了一个“两代人之间教育成就的传递”的现象,而这恰恰是对应于传统社会书香门第的悠久传承。高昂的新式教育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排斥机制,进而阻碍了正常的社会流动,造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断裂”。教育的现代化使得职业体系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日益显要,并实质性地改变了它们的组织模式,包括分层模式。学术友谊或者说同窗之谊,渐渐成为中产阶级都市人的新社会资源或人脉网络,这一切创造了一种新的有机

团结的基础。基于强烈英才教育取向的新式教育体制,成为职业选择的最重要的渠道。在这其中,不同教育层次间的紧密关系继续存在于各个职业领域。在相对应的社会阶级层次上教育和职业制度也产生了紧密联系,因而等级制表面上是非正式的而实际上则非常普遍。原则上以平等主义作为前提的新式教育,但实践中却充满了强烈的精英主义趋向。在追寻这一精英导向的本土根源的时候,儒家“上智下愚”、“君子小人”的等级观念是精英主义趋向的重要思想基础和传统根源。

第四,在对中产阶级职业生涯的考察中,作者揭示出随着新的都市职业的产生,中产阶级进入了一种全新的、各自不同的、以利益为导向的职业共同体。然而,他们并不是只属于单一的职业共同体。人格化的熟人社会网络,或者家庭的社会文化资源仍然起了巨大作用。那么,这个熟人社会又是怎么来的? 作者认为,实际上它不过是家庭亲情伦理关系泛化的结果,是这种关系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嵌入和延伸。在企业内部,职位的流动与晋升除了论资排辈以外,上下级职员之间的关系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传统的庇护关系和人身依附,即所谓站对队、跟对人。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人格被认为是嵌入在社会关系或环境中,这种人格的关系嵌入带有强烈的纵向等级趋向(虽然近代以降越来越受到西方平等主义观念的侵袭)。职业领域对功成业就的重视,乃是依据其对集体的贡献度而最终得以合理化,而非西方式的形而上学的个人主义原则。在企业共同体内,流动与晋升的各种渠道,都倾向于用复杂的纵向等级制度来组织和连接。

第五,本书对中产阶级家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从住房、婚恋、家政、育儿等诸领域考察发现中产阶级小家庭是一个全新的私人